

五、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 (1944年) ——永信烟庄



原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1944年）——永信烟庄

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1944年）——永信烟庄旧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阜民北路16号。遗址原来是一处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现在改建成混合结构的四层楼房的私人住宅。该旧址于1962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永信烟庄是中共钦廉四属地下党组织为掩护活动而开设的一间店铺，作为党的工作联络中心。

1943年3月，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共南路特委指示撤销合浦县、区委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单线联系，由南路特委常委杨甫负责钦廉地区党组织工作。为便于联系和有一个较好的

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杨甫等同志决定在县城廉州租屋开设“永信烟庄”，杨甫则以烟庄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并以此为联络中心从事领导四属党的工作。1944年5月，烟庄正式开张营业。“永信烟庄”的建立，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陆续来与杨甫联系，地下党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常开展。9月22日“永信烟庄”遭国民党合浦特务机关破坏，地下党员伍朝汉、陈普坤、邓荣存被捕，杨甫则在打入到国民党合浦“淮海”自卫队任少尉电务员的中共党员陈耀琪的帮助下得以安全脱险。



现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1944年）——永信烟庄

合浦“永信烟庄”事件

在合浦县城比较繁华的街道阜民北路，有一间当年叫“永信烟庄”的店铺，这是杨甫为掩护身份、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而开设的秘密联络中心。

1942年至1943年，全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其统治区加紧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作的需要，1943年3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指示，撤销中共合浦县、区委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对下属组织改变为单线联系。由南路特委常委、宣传部长杨甫担任钦廉四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各地区党组织。

筹办烟庄

杨甫在1940年冬就以粤桂边区工委领导成员的身份到合浦工作，其大部分时间都以刘德才的化名和经商的身份居住在白沙宏德村和梅菪垌村，以此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杨甫自从担负直接领导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后，感到原中心县委联络机关设在白沙宏德小学，虽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和可靠的群众基础，但地处钦廉地区东南边境，偏于一隅，对地域辽阔的四属地区联络十分不便，加上自己又是外来干部，没有一个较好的社会职业掩护，很难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为此，他想在廉州开个店铺做生意，并曾先后同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何杏雨、灵山特支书记阮明等同志分别谈过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同志都表示赞成。并认为廉州烟庄生意好做，还能帮助解决一些活动经费，因此便决定以做生意作掩护，并把廉州城作为联络中心，加强对四属党组织的领导。

1943年下半年，杨甫即着手筹备开设烟庄的工作。首先是筹集资金，当时合浦党组织经费非常困难，除了有限的党费外，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杨甫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商量，由党组织发动家庭较富裕以及有私蓄的党员捐献。为了党的事业，许多党员拿出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钱交给组织，一些女党员慷慨地献出了金链条、金镯子、金戒子等，还有的同志千方百计向家里要钱交给组织，如西场的王鉴远就变卖家产捐献了二百块光洋，西场党组织收集的款项也最多。这样，到1944年上半年，就筹集了近二十万元“国币”作资金。其次是选择人员，当时决定，烟庄工作人员必须是政治上没有暴露，而又懂点经商业务的党员，最后在北海挑选了当时在公馆璋嘉小学教书回来的党员伍朝汉，在合浦挑选了陈普坤。烟庄办起来后不久，杨甫又把当时北海党组织负责人张树宪调回帮助工作。

1943年7月下旬，杨甫往灵山检查工作并布置建立烟厂，解决合浦烟庄开业后烟丝来源问题。杨甫到灵山后，往灵城糖行街旧华昌号（党员邓毅家）交通站，找来阮明、邓业兢、王文法等人商量，由灵山党组织负责在灵山县城筹办一个制烟加工厂，并通过阮明、邓毅，挑选了有经营烟店生意经验的党员邓荣存为烟庄门市部工作人员，灵山党组织由邓毅负责筹建烟厂，经过一番筹措，即以邓业炯名义向灵山税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在灵山城郊萍塘村南园正式开业，工作人员有张书坚、邓传韬、刘十五哥（刘益基）、陈普隆等党员，以及群众关添、刘二、邓四等。

筹集资金和人员安排问题解决后，杨甫打算找个本地商人合股经营烟庄生意，使烟庄社会化，以免被敌特怀疑，但他是个外地人，在合浦人地两生，只认识经常在广州湾至廉州之间贩运杂货的陈荣坤（地下党员陈普

坤的哥哥)，杨甫过去与他有过接触，知道此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当时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赞成抗日，也没有发现他干过什么坏事。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合股人的情况下，杨甫通过陈普坤的关系，邀请陈荣坤合股经营烟庄生意，陈荣坤用他的洋纱换钱二三元作入股股金。

烟庄开业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烟庄的各项工作基本就绪，1944年7月间，杨甫便在廉州城内靠近西门江边的阜民北路，租了一间两层楼的铺子作为烟铺，定名“永信烟庄”。以刘德才（杨甫的化名）的名义，向合浦税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开始正式营业。这样，作为合浦地下党联络机关的“永信烟庄”，就在廉州城出现了。

烟庄办起来后，杨甫挂名经理；伍朝汉当掌柜，具体负责烟庄经营业务；邓荣存负责烟丝烤制和包装；还有一个姓邓的工友负责杂务。陈普坤、陈荣坤兄弟每日都在烟铺出入，但不负责具体业务。灵山烟厂刘十五哥作交通员经常护送烟丝来，再由烟庄加工成盒装烟丝出售。烟盒的封面设计和绘图是卢文亲手制成的，并在1944年8月9日《粤南日报》第三版刊登广告：

信 永 世出烟名牌机飞	
批 发 零 售 价 格 相 宜 诸 君 光 顾 无 任 欢 迎	种 类 熟 黄 生 烟 烟 切 包 诸 提 烟 特 上 你 君 神 味 种 等 满 一 醒 醇 制 烟 意 试 脑 香 法 叶
号十路北民阜州廉设铺 售代有均处各	

开业以后，伍朝汉等人白天在楼下铺面工作，夜晚就住宿在店里；陈荣坤因为是烟铺的股东，又是陈普坤亲兄，也在烟店楼上住宿。为了保守秘密，杨甫规定：除烟庄人员外，不准任何党员在烟庄住宿。烟庄开业前，他通过党员岑月英的关系，在廉州城郊沙窝冯崇规（岑的舅父）家找到一个住处，就一直住在这里。烟庄开业后，他又通过伍朝汉婶母（当时住在“德国楼”内）的关系，在“德国楼”院内靠近门口的一排房子中租了一间，作为秘密住宿的地方，晚上多数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住在平田一中（现合浦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

“永信烟庄”的建立，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陆续来与杨甫联系。当时杨甫在廉州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余富茵的宿舍“平园”，一个是当时负责联系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祥家。来联系的同志先到岑焕祥家或“平园”与岑、余接上关系，再由他们转告杨甫到来接头。来与杨甫联系的有各地负责同志或交通员，如陈明景、阮明等，这些外地来的同志，多数在外另找地方住宿。有的住岑焕祥家对面的房子，有的住在“平园”，也偶尔有住在烟庄的。

在这段时间里，杨甫利用“永信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对指导钦廉地区党组织活动和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敌周旋

烟庄开业一段时间后，杨甫即动身往灵山、钦县和防城等地检查工作，直到8月底才返回廉州。

8月30日上午，杨甫想到“平园”去找余富茵，了解一下有没有人来

联系过。他从烟庄出来，走到中山路廉阳茶室附近时，见到海南同乡陈干才。杨甫是1938年在广州通过同乡邓楷认识陈干才的。邓是杨初中时同学，1927年入党，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里和杨甫关在一起，出狱后，1936年在余汉谋第五路军当少尉参谋，这时和陈干才在国民党广州市邮政局当邮电检查员，一起住在中华北路，杨甫投宿到邓楷家中后就这样认识了陈干才。

陈干才热情地拉杨甫到斜对面的廉阳茶室去饮茶。陈首先打听杨到合浦来的时间和职业，杨说，自广州沦陷后就做生意度日，东奔西走，在广州湾认识了合浦商人，就到合浦一起做生意。陈又问杨做什么生意，杨即大方地说，开了个烟庄，当杨转问陈干才到合浦来干什么时，陈干才竟然公开对杨甫说：“我是蓝衣社的人。”杨听了心里一惊，但表面仍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以关心老乡的口吻说：“你为什么干这个，做特务是不得人心的。”陈说是混饭吃。杨甫又探听了邓楷的下落之后，两人就分头走了。

陈干才的出现，使杨甫感到了严重威胁，当天晚上，他回烟庄召开党员会议，将遇到陈干才的经过和两人在廉阳茶室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烟庄的党员伍朝汉、邓荣存，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并研究采取了一些对付的措施：一是转移各种文件和进步书籍；二是研究了发生情况时走脱的方法等。大概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张树宪从北海来，杨甫将情况告诉他，并让他在晚上把许多党的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拿到岑焕祥家，由岑焕祥负责处理。与此同时，杨甫又将遇到国民党特务、烟庄可能已经暴露的情况转告了他单线联系的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但是，由于杨甫认为已知道陈干才的特务身份，而自己又有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陈干才还不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可以与之周旋，从中探听敌方情报；加上当时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杨甫舍不得丢掉烟庄的资产。因此，未能采取果断的措施撤出烟庄，而采取了一方面与陈干才周旋，另一方面想找别的商人来接替经营的错误做法。

这时（1944年9月）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寇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开始向湘桂线进攻，钦廉地区再度沦为敌后的严重形势即将到来，形势的紧迫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交织在一起，杨甫认为党的许多工作都要重新布置，因此，打算一边对付着陈干才，一边抓紧时间布置战时工作：①在宣传方面，揭露日寇侵占湘桂线的阴谋目的，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②组织撤退、隐蔽城镇党员。各中学党员学生随学校搬迁，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已经暴露的或难于隐蔽的党员全部撤到农村去，以农村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收集枪支弹药，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杨甫每天照常到“永信烟庄”柜台露面，其他人也依然照常营业。但是，陈干才自遇到杨甫后，就缠住不放，白天经常到烟庄找杨甫聊天，他一个年轻助手杨善龙也经常到烟庄找杨甫和其他店员聊天，这样，杨甫就与国民党特务陈干才、杨善龙展开了危险的周旋。

从9月初开始，陈干才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接近杨甫。说什么在廉州的海南同乡很多，你在这里做生意，要多与老乡来往；有一天他又找到杨甫，说海南同乡会要开会选举理事会，要杨参加；又有一次陈干才对杨说，合浦税务局长是海南同乡，他可以帮说情减轻烟税等等，这些都被杨甫一一敷衍过去。但是在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干才又约杨甫在廉阳茶室喝

茶，大谈他到过重庆和韶关办过华侨商品的事，然后又说了一些国民党在合浦有各派系的特务组织的一些事情，杨甫听了始终不露声色，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是生意人，对这些不感兴趣。”陈干才又说：“我听别人说你是八字脚的呢！”并要杨暂时离开廉州，杨甫说：“人家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我做我生意怕什么，我不离开廉州。”陈接着说：“不离开也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告诉你的。”陈干才花言巧语，多方试探，但是杨甫只谈生意，不讲政治。这次谈话以后，杨甫预感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已步步逼近，他立即召集烟庄党员开会，将陈干才在廉阳茶室对他讲的话告诉了大家。杨甫把他单线联系的、当负责联系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祥调回勾刀水去当教师。当时张树宪、陈普坤两人在合浦医院留医，暂不回烟庄。杨甫又抽空去合浦医院探望张树宪和陈普坤，杨在医院里又碰上了陈干才。陈干才说：因家里生活困难，让他老婆在医院里当了护士，并介绍杨甫与他老婆认识。杨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张树宪和陈普坤，并嘱他们小心提防。

9月18日傍晚，陈干才又来到烟庄，他站在烟铺的屋檐下很认真地低声对杨甫说：“最近我听见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还有一部电台呢！”杨甫心里一惊，但马上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说：“真是胡说八道。我是做生意的人，要电台干什么！”陈干才接着说：“不是就算了，我是听别人说的”说完就走了。从这些迹象表明，杨甫的身份早已暴露，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杨甫除了将这些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之外，还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退，而是错误地决定，迟三天才撤离烟庄。

遭敌破坏

1944年9月21日黄昏，陈干才的助手杨善龙到烟庄找杨甫，杨甫不在，他就坐在柜台对面与伍朝汉谈天，看样子是想等杨甫回来。等了一会不见杨甫回来，他便走了。这件事并未引起烟庄同志的注意，入夜以后，大家关了店门就睡觉了。

9月22日凌晨4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国元调集八区专署保安团、“淮海”自卫队共1000多兵力，突然全城戒严，包围“永信烟庄”。伍朝汉、邓荣存突然被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他俩急忙起床，先叫睡在楼下的那位工人不要开门，然后两人即从烟庄后门走出，那位工人跟着出来后，翻过右邻一间中药店的后墙到了江边，伍、邓二人过不了江，便沿着江边往东北方向走，被戒严的保安队截住，就这样被捕了。敌人把他们押回烟庄捆绑起来，搜查了烟庄。天亮后，敌人又把他们押到保安团部。与此同时，敌人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住在医院另一层楼的张树宪，由于得到陈耀琪（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合浦“淮海”自卫队少尉电务员）的及时通知，便跟着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佩带手枪的陈耀琪离开医院，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成功脱险

敌人在“永信烟庄”没有抓到杨甫，即在全城封锁交通，逐户搜查。杨甫这时正好在“平园”余富茵处。原来，这一天，杨甫离开烟庄，同往常一样，绕过几条僻静的小街，来到小巷深处的“平园”。“平园”是一个小小的园子，园子里座落着一座平房，园内环境幽静，这里原是廉中教师谭宏全的住宅。我地下党员、一中学生余富茵和几个同学暂时租作宿舍。

因此，这里就成了我党一个重要联络点，也是杨甫晚上居住的地方之一。那晚杨甫来到这里，和余富茵商谈布置了工作之后，已是深夜，就上床睡觉了。睡下不久，就听到一阵阵打门声和“快开门，查户口”的吆喝声，从附近街上传来。“平园”同样有人打门，杨甫和余富茵急忙起来，两人感到情况变化突然，便急中生智，杨甫先到后院的杂草堆隐蔽起来，余富茵赶快叫屋主王大叔（谭宏全的岳父）起来开门，王大叔把门打个半开，只见保长带着几个警察打着手电筒来到门口，王大叔放开大嗓门说：“这里只有我女婿谭宏全在廉中教的几个学生住，没有外人。”然后又放慢声调说：“不信可入来检查。”这位王大叔平时靠卖花生度日，是个大酒鬼，可能带路的保长相信这个酒鬼老头不会说假话，只说声“走”，就带着那几个警察转到随达书院那条小街去了。

等王大叔关上门，余富茵急忙来到后院，将情况转告了杨甫，两人立即将日积月累保存下来的大批党的文件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用水浸湿搓成纸浆，倒进挖好的泥坑里掩埋起来，等到处理完这些文件、报刊，已将近天亮时分。

天亮时，杨甫想出去探听一下动静，便独自沿着“平园”外那条小街往中山路方向走去，刚到街口，便看到大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军警在来回巡逻，他赶快退回“平园”。余富茵把园门关上，不让杨甫再出去，并同杨甫约好，由他出去了解情况，不超过一小时就回来。余富茵别上布质校章，带上书本，骑着单车出去了。国民党军警对学生和公务人员都不盘问，因此他便畅通无阻来到烟庄附近，只见店门紧闭，大门上七歪八斜地贴满了盖着血红大印的封条，街上行人皆止步观看，议论纷纷。在烟庄对面的店

铺门口，还有两个穿便服藏带着手枪的家伙，在鬼鬼祟祟地转来转去。余富茵急忙赶回“平园”，将烟庄被封等情况告诉杨甫，但烟庄的同志谁被捕了还不清楚。杨嘱余再出去探听。余富茵来到平田一中时遇到来找王献芝的张树宪，知道敌人昨晚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两人简单交换了情况后，张树宪便坐余雇请的单车离开廉州。余打算回“平园”，凑巧在平田公路上遇到陈耀琪，余带着陈直奔“平园”见杨甫，三人交流了情况，到这时，大家才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昨晚发生的“永信烟庄”被搜查，党员伍朝汉、邓荣存、陈普坤被捕的严重事件。

这时已是晌午时分，街上的敌人戒严还未解除，杨甫认为必须立即离开廉州，就同余、陈两人商量走脱的办法。陈耀琪想了一会，说：“戒严部队上午12时以前收缩岗哨，这么多兵，都还没吃早饭，饿得呱呱叫，现在各部队各自为政，大南门只留一个哨兵，平园小街通往南康马路上戒严的都是淮海部队的兵，而且多是南康人，和我很熟，我可以掩护三叔（杨甫）出去。”三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杨甫化装成公职人员，由陈耀琪用单车搭乘通过小南门、大南门“淮海”部队岗哨，送往南康。决策已定，三人吃过午饭，杨甫迅速向余富茵布置了几件事：一是通知廉州党支部书记王献芝立即去灵山，将“永信烟庄”出事的情况转告阮明，并写下了找阮明的地址；二是了解被捕同志的情况报告组织；三是关照进步人士、一中教师符筑。然后即刻化装，杨甫换穿黑胶绸便服，戴上白通帽，扮成国民党地方官员；陈耀琪原穿军官服装，扎着皮带，戴着蓝边一粒星的布质“少尉”胸章，配着手枪，稍一整理，神气十足，化装完毕，先由余富茵到小南门城头侦察一番，情况没有变化，便立即出发。这时大约是下午二点钟，陈

耀琪骑着余富茵借来的“三枪”牌单车，后架上搭着杨甫，往城南急驰而去。他们通过小南门出城基公路，又通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沿途站岗的国民党自卫队士兵，看着他们的军官骑车搭着一个“官员”通过，非但没有进行盘查，还持枪肃立向他们敬礼。在后面关注的余富茵目送他们出了城郊，才转回城里。杨甫就这样在陈耀琪、余富茵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伍朝汉等三人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和合浦监狱，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审讯，他们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漏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国民党广东八区专署反动当局抓不到被捕同志的证据，加上当时日寇南侵，形势紧张，只好把他们投入合浦监狱关禁起来。1944年12月，日寇从南宁向广州湾撤退，合浦反动派弃城而逃，看守廉州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撤走，伍朝汉等三人即和同狱难友打开牢门，越狱出来，到了附近农村。当天日寇就通过廉州城向广州湾方向撤去。后来伍朝汉去到石头埠找到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陈普坤去南康，邓荣存回到灵山，也分别找到了党组织。

“永信烟庄”事件发生后，王献芝赶往灵山找阮明，转告“永信烟庄”出事情况后，灵山及时撤退了烟厂。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地党组织在得到情况后，作了必要的隐蔽撤退，没有惊慌失措，在遇到这样大的突然事变中表现出平静和镇定。杨甫脱险后到南康找到陈符隆时，凑巧南路特委交通员小陈来通知他立即回特委。于是杨甫随小陈到白沙宏德小学，把爱人谭德和孩子撤往灵山南横山头村后，即回到广州湾特委机关。中共南路特委了解后即对杨甫进行停职审查，并决定暂时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活动，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各地党员在停止组织关系的情况下，

一直坚持斗争，直到 1945 年 2 月全面举行武装起义后，四属党才逐步恢复组织关系。

主要人物简介

杨 甫



杨 甫

原名吴世栋，曾用名杨昌龄、胡宏盛、刘德才，代号“三叔”，1908年10月出生於广东省海南琼海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党员。以后历任琼海县共青团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琼海县苏维埃政府秘书。1929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疏散到南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先后任马来亚洋务工人支部书记，马来亚共青团新加坡区委宣传干事、马来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在新加坡被英殖民当局逮捕，随即引渡回广州，被国民党当局判刑五年。出狱后，积极寻找党组织，1938年5月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恢复组织关系。此后历任广东花县特支书记，罗定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三罗特派员，粤桂边区工委常委、组织部长，西江特委常委、干部部长、组织部长。

1940年任南路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钦廉四属特派员，在合浦领导钦廉四属党的工作。杨甫积极领导了白石水抗日自卫武装斗争，先后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军事“围剿”。后来，广东省委下令把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杨甫虽有不同见解，但还是从纯朴的感情出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他从南路特委接受指示后即赶回合浦，召集中心县委成员在白沙宏德小学开会，传达贯彻。

此后，杨甫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艰苦地培养和积蓄力量。杨甫还亲自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42年7月，在白沙宏德中心县委机关举办各区领导参加整风学习班，学习党中央的整顿“三风”文件，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运动。

1944年夏天，杨甫在合浦廉州城开设永信烟庄，作为钦廉四属党组织的联络机关掩护点。杨甫化名刘德才出任烟庄老板。烟庄开业后，以专营烟丝之便，经常同合浦、灵山、钦州、防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或交通员联系，传递情况和书刊，部署工作，对钦廉四属党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由于杨甫政治思想麻痹，烟庄被敌特破坏，给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训极其深刻。

1945年10月，杨甫任南路特委人民解放军西征十万大山老一团政治督导员。

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央马列学院教育干事、科长、班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院党委委员。马列二分院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主任、副院长。

1957年后任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委员、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遭反革命阴谋家康生的迫害，降级降薪贬到湖南长沙县任副县长。文革期间，又遭“四人帮”康生之流抓住“合浦永信烟庄事件”不放，进行政治迫害。1979年平反冤案，返回北京工作，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顾问，1982年离休。1990年在北京病逝。